

《妇女周报》的妇女解放思想

刘人锋

(湖南女子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妇女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份反映全国妇女运动状况的妇女报纸,也是第一份国共合作的妇女报纸。《妇女周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逐渐消除妇女运动中狭隘的女权观点,把妇女运动从停留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中解放出来;指出不能把妇女参政运动变成妇女做官运动,必须考虑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利益,重点应该是发动广大妇女争取立法权,为全体妇女谋取应该享有的权利,因而非常支持女工争取正当权益的斗争。《妇女周报》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国民会议,呼吁国民会议应该是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并且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关键词:《妇女周报》; 妇女运动; 向警予; 国民会议

中图分类号: D693.9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4-0082-05

Ideas on Women's Liberation of *Women's Weekly*

Liu Ren-feng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Women's Weekly* was the first women's newspaper reflecting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in the first cooperation of KMT-CPC, it was also the first women's newspaper by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Women's Weekly*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a program to eliminat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narrow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which thinks the women's movement is the slogan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movement of women in politics can not become an official women's movement, must be consider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ests of oppressed women, the focus should be launched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of women, all wome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seek and therefore very supportive of women's struggle fo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other important concern of *Women's Weekly* is the National Assembly, it called for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be the people's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conferences.

Key words: *Women's Weekly*; women's movement; Xiang Jing-yu; National Conference

一、《妇女周报》的诞生

1923年8月22日,一份反映全国妇女运动全貌的妇女报纸——《妇女周报》在上海创刊,它是由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与《现代妇女》两个刊物合并改组而成的。

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的《民国日报》,最初是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而创办的,其早期负责人和筹办者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当时奉派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的陈其美,报纸日常经

理和编辑事务则由邵力子和叶楚伦负责。上海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左派党员共同组成副刊部,主持副刊工作。《妇女评论》于1921年8月3日在上海创刊,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出版,每周三刊出。当《妇女评论》创刊的时候,“正值四五(应为“五四”——笔者注)运动前后发刊的三百几十种定期刊物几乎完全停刊的时候。那时,言论界消沈极了,反动派乘虚显出势力。所谓妇女问题者,几乎有重复回到五四以前一味恋横不成问题的险象。”那时妇女运动零落不堪,《妇女声》也还没有创刊,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同人“实想尽了我们的底微力,与愚夫斗,与顽力斗,为未来青年修直了一段道路”,^[1]于是创办了《妇女评论》。《妇女评论》是当时唯一的研究妇女问题的定期刊物,主张“解放了历来施于女性的种种束缚,让女性自由发展出伊们底能力

收稿日期: 2009-08-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XJK06QGD073)

作者简介: 刘人锋(1972-),女,湖南宁乡人,湖南女子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来。凡思想、制度，能够成为新锁镣的，我们都要不容情的攻击。”^[2]《妇女评论》一直遵循这一主张，至1923年8月15日终刊时，共出版了104期。

被称为《妇女评论》“可爱的妹妹”的《现代妇女》，是由妇女问题研究会和中华节育研究社于1922年9月6日在上海共同创办。妇女问题研究会于1922年7月由沈雁冰、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夏丏尊、章锡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以研究妇女问题为主要内容，目的是“图谋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进化”。^[3]上海的中华节育研究社，是在倡导生育节制的美国人山额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 1883—1966)于1922年4月中旬来华宣传节制生育后成立的，受到山额夫人的影响，主张限制生育。《现代妇女》的发刊，目的在于帮助过去的妇女成为现代的妇女，即“从过去的一切压抑中抬头，从过去的一切束缚中解放，从过去的一切支配中独立”^[4]的妇女，取得妇女所应有的一切自由。《现代妇女》的内容除了努力体现它的目的外，还刊登许多中华节育研究社的宣传文章。

《现代妇女》创刊的时候，国内妇女运动“由女子参政运动之诱引而向前突进”，妇女运动有了新发展，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等主张妇女参政的团体相继成立。

“国内实际的情形既已变换得如此之快，我们执笔讨论学理批评事实的人们应得更加努力，方足尽指导批评之责。”^[5]为了更加有效地研究妇女问题，扩大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评论》社和妇女问题研究会合并改组，将《妇女评论》和《现代妇女》停刊，在它们的基础上创办《妇女周报》。

《妇女周报》创刊后不久，国共正式开始合作，上海《民国日报》仍旧作为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叶楚伦任总编辑，邵力子任经理。《妇女周报》作为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出版，由国民党上海党部妇女部领导，每周三刊出。原《妇女评论》和《现代妇女》的编辑大部分成为《妇女周报》的编辑，邵力子和共产党员陈望道、沈雁冰及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曾任主编。《妇女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份重要的妇女报纸，在出版至第100期曾停刊，后又另编期号重新出版，大概到1926年1月27日出版第89期后最终停刊。

《妇女周报》创刊时，正值北京曹锟、吴佩孚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的时候。曹锟贿选为总统，全国人民掀起了反贿选、反曹吴的群众运动，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妇女运动在这时也进入到了新的高潮。

《妇女周报》以“批评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与妇女问题有关的事实”作为它的“精神所在”，^[5]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联系政治斗争形势，批评一切阻碍妇女解放的现象，反映与指导全国妇女运动。《妇女周报》前100期的内容基本实现了它的宗旨，由于暂时没有找到复刊后的《妇女周报》，暂只能以前100期作为研究对象。

考察《妇女周报》，向警予特别应予以重视。向警予是中共杰出的妇女运动领导者和报刊工作者，《妇女周报》创办时她奉党的指示，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部长助理的身份主编这份妇女报纸。从1923年8月下旬开始，一直到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不久，在将近两年时间的的时间里，向警予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积极宣传党的妇女运动思想，引导该刊的宣传面向“要求解放最迫切的，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无产阶级妇女，呼吁妇女与被压迫的男子一道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由于向警予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一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向警予在《妇女周报》上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的观点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工作的观点。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日渐右倾，“西山会议”后，完全由国民党右派所控制。鉴于《民国日报》的变质，向警予退出《妇女周报》的编辑工作，《妇女周报》的国共合作时期随之结束。

二、批判狭隘的女权观点

《妇女周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逐渐消除妇女运动中狭隘的女权观点，把妇女运动从停留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中解放出来，为后来妇女参加国民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时的女权运动者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完全、仅仅归罪于男子，把男性压迫女性提到不适当的地步。向警予指出妇女运动是“对付一切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而不是女子对付男子”；^[6]因为剥夺妇女权利的并不是男子，而是社会一切恶制度和恶势力。对此，杨之华持相同的观点，她说“妇女运动的对象决不在乎男子，而在乎制度。”^[7]《妇女周报》多次号召妇女与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男子携手，共同推翻军阀政府的统治。

当广东、湖南的议会中有女议员后，一些女权运动者热衷于做女议员，做官的风气流行一时。有的人

认为“中国政治之改善,将于我女子参政见其端”,甚至认为没有任何口号比得上参政运动这样“容易号召众人了”。^[8]其实,在军阀专制下要求取得真正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从当时的条件看来,妇女参政运动既不是唯一的急需,也不是妇女解放的有效途径。针对部分女权运动者唯参政至上的观点,向警予在《评王璧华的女权运动谈》一文中对浙江省女议员王璧华重女子做官而轻立法的主张提出质疑,指出不能把参政运动变成做官运动,参政运动必须考虑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利益,重点应该是发动广大妇女争取立法权,因为“立法运动系从根本上创造保障女权的法律”,^[9]它的成败与妇女全体的利害息息相关,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形成大规模的妇女运动。中国的妇女运动是为全中国的妇女争取普遍的权利,不是为少数妇女争取利益,“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10]

对于当时的知识妇女,向警予把她们分为三派。小家庭派和浪漫派完全建筑在个人的快乐主义之上,职业派虽然比较有社会意识,对妇女地位的提高不无意义,但是与其它两派共同的缺点是“缺乏综合的人生观和全盘的社会意识”。^[11]这“综合的人生观”实际上指的是一个非片面的方面,一旦这个方面解决了,其它相关问题也都解决了,这个方面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12]因为政治与女权有密切的关系,“女权运动本身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有了民权运动才有女权运动,女权运动绝对不能离开民权运动而独立。”^[10]妇女的权利只能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去争取。在军阀的专制统治、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去争取女权,就象在沙滩上建房子,缺乏牢固的基础,随建随倒,这已为民国以来妇女争取参政权的失败事实所证明。“全盘的社会意识”指的就是知识妇女应该与劳动妇女联合,不仅因为劳动妇女的处境最为艰难,而且因为妇女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而是为全体妇女谋取应该享有的权利。

向警予说:“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13]邵力子说:“女权运动必应从联合无产阶级的女工做起,不然只是少数太太小姐们想出风头罢了。”^[14]这不仅仅是她/他们个人的观点,更是《妇女周报》指导妇女运动的方针。在当

时的妇女中,生活最痛苦的是工厂的女工,相应的她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最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由此之故,《妇女周报》十分重视女工,认为她们是妇女运动的基础,及时报道、指导女工运动。

《妇女周报》非常支持女工争取正当权益的斗争,1924年6月14日,上海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名女工举行大罢工,在第44期上用巨大篇幅登载她们的诉苦书并予以精神上的支持。1924年3月14日上海祥经丝厂女工被活活烧死一百余人,《妇女周报》对此表示严重抗议,愤怒指责资本家及其走狗“不是把女工看作娼妓就是看作盗贼”。^[15]《妇女周报》还刊登许多女工团体的宣言,如广东电话局女司机联合会征求会员的宣言(第57期,1924年10月1日)、上海丝纱厂女工协会的宣言(第22期,1924年1月16日)等,全面反映全国女工运动情况。

上海丝厂女工为了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从1922年起就开始斗争,但是都没有成功,在《一个紧急的提议》中,《妇女周报》真诚热切地具体指导丝厂女工要求减时增资的斗争(第6期,1923年9月26日)。在《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中,又号召十多万丝厂女工全体加入丝茧女工团,在丝茧女工团的统一指挥下斗争,“团结奋斗是唯一的武器”,“有了团体,势力才能集中”。^[16]在《九姑娘犯了何罪?!》中一方面为丝厂被押女工抱不平,另一方面愤怒指责在资本社会里劳苦女工的生命一钱不值(第6期,1923年9月26日)。《妇女周报》痛心疾首于丝茧女工不团结,而只是“哀告和请愿”,再次告诫她们如果“劳工本身不能团结,而只眼巴巴地望着社会的救援,或是苦求官厅主持公道”,^[17]这实在是做梦。

三、主张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

国民会议是《妇女周报》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1924年10月,直系、奉系军阀之间的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京,将曹锟、吴佩孚赶下台,史称北京政变。顿时时局十分混乱,军阀的统治更加腐败。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呼吁召开一个由群众直接选举的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人民民主共和政权,孙中山亦发表对时局的宣言,疾呼召集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后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响应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妇女运动也被激活,各地女界

国民会议促成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妇女周报》密切关注这一运动，积极动员妇女投入这一运动，并在这场斗争中解放自己。

为了使妇女尽快投入到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中去，《妇女周报》用很多篇幅阐明国民会议的深远意义，指出目前摆在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人民乘势奋斗，成功人民政治”，一是“人民坐失机会，让军阀专政”。^[18]而国民会议就是“成功人民政治”的组织 and 武器，如果这个时候不组织一个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那么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将趁机组织为他们所“御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如此必将延长中国的乱局”。^[19]

《妇女周报》对国民会议寄予无比的希望，强调妇女与男子一样都是国民，对于国是都有解决的权利与责任，而且“妇女占国民之半数，受压迫最甚，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至切”，^[20]因而妇女更应该参加国民会议。为此，《妇女周报》一再号召妇女积极支持国民会议，向警予特别号召女权运动同盟会的成员对国民会议由观望、等待的态度迅速转为积极参与，“真正为国家与女权而奋斗的姊妹，敢请屏除陈见，毅然决然站到丁派（指主张和促成国民会议派——笔者注）一边来”。^[21]

为号召全国妇女争取自己的利益，并促进国民一般利益的实现，向警予更进一步主张妇女团体要参加国民会议。从妇女的一方面来说，“国民会议如无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则所谓废除一切障碍女权发展之法律、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等等主张将无法提出，更无法可以实现”。^[22]从国民会议的一方面来说，“如果国民会议妇女团体不参加，妇女简直没有机会在国民会议中发表政见，而国民会议亦终于是个半面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非全个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23]在争取妇女对国民会议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同时，《妇女周报》更加深入地指出即使妇女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国民会议没有妇女团体参加的话，那么“这个战利品——权利，只是等于画饼充饥的把戏”。^[24]她以妇女深有体会的事实警醒妇女们：“试问以女子现在所处的地位，能在各省区选举中当选吗？能在各省区教育会，农会，商会，工会中当选吗？”^[24]因此，当北京国民会议促成总会女代表团正式提出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之后，立即得到各地妇女团体的响应。

在北京政变后，最初是上海的二十多个妇女团体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后天津、杭州、广州、

温州、南京、北京、湖南、江西、山东等地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向警予对此高度评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25]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提议各地派代表进京组织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向警予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如果成了功，不独是国民会议的长城，而且由此必然形成一个将来专为妇女解放奋斗的全国集中统一的机关，使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能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25]

《妇女周报》从一开始就表示所要求的国民会议是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不是段祺瑞所号召的军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当段祺瑞政府公布的《善后会议条例草案》剥夺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的政治权利，规定代表的资格为“元帅、为此次战争胜利之首领，为督军，为省长，为名流”时，《妇女周报》及时揭露“善后会议”的实质，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所需要的所希望的国民会议，不是军阀官僚所组织的，是人民团体所组织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坚决表示“若非代表人民谋利益的国民会议，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绝不承认这一套宰割人民的旧把戏！”^[26]

段祺瑞的国民会议条例第14条和第48条都专门标明男子，把女子排除在外，经过抗争于1925年3月20日将“男子”改为“国民”，但是不到一个月善后会议仍将“国民”改为“男子”。向警予呼吁反对和修正国民会议条例，女子应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要求妇女团体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10]。在《妇女周报》的积极推动下，女权运动同盟会亦参与到反对段祺瑞国民会议的运动中。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向全国妇女团体发出通电，表示对此“誓不承认”。^[27]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亦表示：“决不屈服于军阀强权之下”，“当努力促成真正国民会议，贯彻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之主张”。^[28]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全国“此等不由民众制定，剥夺女权之国民会议条例，我全国女界誓不承认”。并且非常激愤地表示：“将来御用之国民会议集会时，所有议决各案，概不发生效力”。^[29]

参考文献：

- [1] 佛突. 两周年的感言[N]. 妇女评论, 1923(104), 1923-08-15.
- [2] 佚名. 宣言[N]. 妇女评论, 1921(1), 1921-08-03.

- [3] 佚名. 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及简章[N]. 妇女评论, 1922(52), 1922-08-02.
- [4] 佚名. 发刊词[N]. 现代妇女, 1922(1), 1922-09-06.
- [5] 佚名. 《妇女周报》发刊词[N]. 妇女周报, 1923(1), 1923-08-22.
- [6] 向警予. 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N]. 妇女周报, 1925(79), 1925-03-29.
- [7] 杨之华. 女同胞们快起来反对善后会议[N]. 妇女周报, 1924(65), 1924-12-27.
- [8] 佚名. 女权运动与参政运动[N]. 妇女周报, 1923(8), 1923-10-10.
- [9] 向警予. 评王璧华的女权运动谈[N]. 妇女周报, 1923(8), 1923-10-10.
- [10] 向警予. 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N]. 妇女周报, 1925(79), 1925-03-29.
- [11] 向警予. 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N]. 妇女周报, 1923(15), 1923-11-28.
- [12] 向警予. 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N]. 妇女周报, 1923(12), 1923-11-08.
- [13] 向警予. 妇女运动的基础[N]. 妇女周报, 1925(81), 1925-04-13.
- [14] 向警予. 一个紧急的提议[N]. 妇女周报, 1923(6), 1923-09-26.
- [15] 邵力子. 关于上海洋经丝厂女工被焚的社评[N]. 妇女周报, 1924(29), 1924-03-12.
- [16] 向警予. 告丝厂劳苦女同胞[N]. 妇女周报, 1923(6), 1923-09-26.
- [17] 向警予. 丝厂女工团结起来[N]. 妇女周报, 1923(14), 1923-11-21.
- [18] 向警予. 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N]. 妇女周报, 1924(65), 1924-12-27.
- [19] 佚名.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对全国女同胞宣言[N]. 妇女周报, 1924(64), 1924-12-14.
- [20] 佚名.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之经过[N]. 妇女周报, 1924(64), 1924-12-24.
- [21] 向警予. 敬告女权运动同盟会诸君[N]. 妇女周报, 1925(66), 1925-01-04.
- [22] 向警予. 应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N]. 妇女周报, 1925(81), 1925-04-13.
- [23] 向警予. 国民会议与妇女[N]. 妇女周报, 1924(64), 1924-12-14.
- [24] 佚名. 应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N]. 妇女周报, 1925(81), 1925-04-13.
- [25] 向警予. 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N]. 妇女周报, 1925(68), 1925-01-11.
- [26] 杨之华. 女同胞们快起来反对善后会议[N]. 妇女周报, 1924(65), 1924-12-27.
- [27] 佚名. 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反对国民会议条例之通电[N]. 妇女周报, 1925(84), 1925-04-26.
- [28] 佚名. 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宣言[N]. 妇女周报, 1925(85), 1925-05-03.
- [29] 佚名. 女界对于国民会议条例一片反对声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之通电[N]. 妇女周报, 1925(86), 1925-05-10.

责任编辑: 曾凡盛

(上接第 81 页)

君子的精神宗旨与处事方法是“和合”，这使得君子在古代中国社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言必称君子的事实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人才训示价值。培养社会人才必须本着与世界、社会、国家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是“生生”变化与天地人“和合”的统一。

和合会通。“君子”话语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在于君子适应了社会、国家发展的需要，既是精神的需要，还是人才的需要，又是社会德性的化身。这种适应的方法宗旨就是“和合”统一、博学会通。因此，当今在培养人才时要能造就博学会通型的“和合”人才，能通天地人，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结合，而不仅仅造就一些纯粹专业性的人才。特别要造就高级管理型的人才，博学会通，是科技与人文的结合。

“生生”变化。“君子”话语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在于君子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变化发展、与时俱进是“君子”话语长期存在的关键。“易为君子谋”，“易”就是变化发展。“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干。”(《周易·系

辞上》)不断地变化更新，生生变化能成就伟业。因此，当今社会之才要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不断探索、挖掘新思维、新方法，以增强对世界与国家治理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71.
- [2] 黎翔凤. 管子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3]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74.
- [4]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57.
- [6]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48.
-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8]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48.
- [9] 汪荣宝. 法言义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514.
- [10]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
- [1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78.
- [12] 张立文. 和合哲学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65.

责任编辑: 曾凡盛